

近代中国道路选择史论

高宝柱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序 言

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岁的大庆之年。

年初,宝柱同志在1998年出版了《生产力形态学与生产力标准观——精神文明建设先行战略的生产力哲学探论》专著之后,又撰写了一部旨在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由来的题为《近代中国道路选择史论》的新书稿。我很高兴此书能作为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理论武装工程向建国50周年的献礼作品,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

历史,不仅由于它承载着丰富的知识、智慧、经验,能够教人温故知新、慎思明辨,判断是非、决定行止,而历来就被我们的先人看作是“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①,并且,还由于它蕴蓄着客观的规律,“指示着将来的方向”^②,而更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1938年,毛泽东同志即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① 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见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31页。

②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17页。

因此,“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①。邓小平同志对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同样十分关注。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必须“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②。江泽民同志更是把学习历史,作为关系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提到了空前突出的地位。他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③;“一个政党”,如果“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④;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⑤。宝柱同志的这部新书稿,正是响应了江总书记的号召,专门研究“对于坚定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极为重要”,“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极为重要”,“对于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也极为重要”的,近代以来“我们的先辈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533页。

②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

③ 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④ 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

⑤ 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⑥ 江泽民《在全国省、区、市党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的客观规律。对于出自我市社科理论工作者之手的这一意义重大的选题成果的即将问世,我怎能不感到高兴呢?

然而,更令我高兴的,还是在阅读书稿之后所感到的宝柱同志这部新著所具有的理论、学术价值和宣传、教育作用。

就学术层面来说,宝柱同志的这部著作,至少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带有一定创新意义的贡献。

一是在对中国近代历史过程的研究和总结上,这部著作尝试了一种新视角。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加蓬总统邦戈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①。邓小平同志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所作的这种回顾,明确指示了研究、总结中国近代历史全部过程的一个崭新视角,也即是出路探寻、选择嬗递的视角。宝柱同志的这部新著,依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从出路探寻史、选择嬗递史这一崭新视角,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进行了一种新的研究和新的总结。全书以“资本主义选择的步步深入与一再失败”开篇,以“两种不同选

^① 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206页。

择的对比检验与胜败分晓”作结,而以“社会主义选择的必然产生与初步探索”为中介,雄辩地证明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①的历史”;“就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关系的演进、所处时代环境的转换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选择,产生了社会主义选择,而后又经过长期斗争,终于使社会主义选择在由少数先进分子的意志最后变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的同时,又由主观蓝图转化成为客观现实,也即是转化为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化为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之中正凯歌行进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难过程”。历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虽然或多或少都要涉及上述内容,但以其作为专门对象的专门著作,则直到目前似还未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宝柱同志的这部专门揭示社会主义中国历史由来的专著,尽管还并不成熟、并不精到,但毕竟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率先撰写了一部初具脉络的中国近代道路选择专史。

二是在对中国近代历史转折的叙述和论证上,这部著作进行了一番新拓展。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近代中国人民道路选择的历史转折点,从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转折点,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不屈不挠艰苦探寻国家和民族出路的中国人民,“只是在这时”,只是在“经过俄国人的介绍”“找到了马克思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才“从思想到生活”,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面目”也正是因为有了代表和推进科学社会主义选择的中国共产党,才“起了变化”^①。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述,明确指出了,了解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所引起的中国人民道路选择的根本转折以及这种转折的根本内容和它的如何发生与何以发生,正是从最深本质层次上,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客观走向的中心和枢纽。宝柱同志的这部新著,紧紧抓住了这个中心和枢纽,在对其进行叙述、阐发和论证的时候,细密、系统、深刻地进行了一番新的开掘和拓展,从而在这具体的一点上,提高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水平。比如,“十月革命”到底怎样帮助了全世界的和中国的先进分子,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于“俄国人的路”,又究竟了解到了哪些方面、哪种程度,宝柱同志在“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制度,路标鲜明”这一专节里,就依据确凿的史料,从“拯救中国、发展中国”究竟必须“依靠什么力量”、“寻找什么盟友”、“经过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步骤”、“建立什么制度”、“坚持什么主义”六个方面,进行了一一梳理,条分缕析,从而在细密性和系统性上,都比此前的其他中国近代史著作有所前进。又如,对于人民在历史道路选择上的上述根本转变,也即是十月革命对中国近代历史转折的决定性影响,为什么能够发生和最后胜利,宝柱同志则以“世界资本主义步入低谷,惨淡退落”和“中国工人阶级登上舞台,奋然崛起”两个专节,分别从全球时代背景和国内阶级基础上,进行了详细叙述与论证,其细密性和深刻性,同样比此前的其他中国近代史著作有所拓展。就这个有限的意义而言,同样可以说,宝柱同志的这部专门揭示社会主义中国历史由来的新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页。

著,尽管并不精到,并不成熟,但毕竟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认真写出了一篇初具规模的中国近代历史转折专论。

众所周知,衡量一项社科理论成果学术价值大小的标准,主要是看其在研究上是否有所创新。宝柱同志的上述两点贡献,一个属于研究视角、研究框架上的创新,一个属于研究广度、研究深度上的拓展,虽然力度都不是很大,但毕竟在这个领域较前人有所发展,所以应该予以肯定。

不过,我所更欣赏、更看重的,却还是它所具有的宣传价值和教育价值。邓小平同志在同加蓬总统邦戈的谈话中郑重指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也即是不了解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拯救中国、发展中国的唯一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所以,“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①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又指出,“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做基础”^②。他们的话,都说明了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教育干部,对于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宝柱同志的这部新著,在形式上具有独特的文风,在内容上,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走不通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必然性,其所用以证明的论据,大部分都是出自当时的历史见证人,有许多还是出自资本主义选择的代表者自己,因而就更能打动人心,更能令人信服。尤其是,它不是只停留于感性的举证,而是更着重于理

① 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6页。

② 江泽民总书记为祝贺22卷本《中国通史》出版写给该书总主编白寿彝教授的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总第162号(1999年6月8日)第1版。

论的分析,因而具有相当的深度。所以,虽然存在着行文不很通俗、读来不很明快这一缺点,却仍不失为我们目前对广大干部和青年进行历史教育、国情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难得的教材。太原市的社科理论工作者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既有一定学术价值,又有一定宣传价值的历史学著作,我当然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希望宝柱同志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以自己潜心研究的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来报效人民,报效太原,报效祖国;同时,我也希望全市的社科理论工作者,在建国 50 周年之际,在我们将要跨入新世纪的重大历史时刻,思想更清醒,政治更坚定,精神更振奋,研究更活跃,加强协作,互勉互励,以更丰硕、更优异的成绩,为我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面胜利,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谨此作序,以为推荐。

黄 征

1999 年 7 月 10 日



高宝柱，中国共产党党员。山东省莘县人，1952年生。1965年上初一，1969年起当过3年煤矿井下开拓工人，后在矿区宣传部门和党校担任理论教员。1981年获大专学历，1998年又获本科学历。1967年初，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解，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原著，历30余年，至今不辍。举凡马克思主义原著，国际共运各党各派文献，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探讨著作，国内外著名学者撰写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著作，有中文版本者，几乎全部读过。1985年调入太原社会科学院，1992年起任副院长。代表性著述有论文《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一国两制”构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生产力实质论与生产力标准观》，专著《生产力形态学与生产力标准观——精神文明建设先行战略的生产力哲学探论》，公开发表科研成果总计逾百万字。

目 录

序 言	黄征(1)
引 论	(1)
第一章 资本主义选择的步步深入与一再失败	(10)
第一次尝试,太平天国后期的为政 蓝图——《资政新篇》	(15)
第二次尝试,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 运动——戊戌变法	(20)
第三次尝试,资产阶级进行的暴力 斗争——辛亥革命	(31)
第二章 社会主义选择的必然产生与初步探索	(42)
第一巨大变,世界资本主义步入低谷,惨淡退落 ...	(59)
第二巨大变,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制度,路标鲜明 ...	(72)
第三巨大变,中国工人阶级登上舞台,奋然崛起	(143)
第三章 两种不同选择的对比检验与胜败分晓	(180)

第一个回合,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与第一次破裂……	(185)
第二个回合,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与第二次破裂……	(206)
结 语	(241)
主要参考书目	(251)
后 记	(266)

引 论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 50 年的光辉历程。

它的这个历程,首先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证明了由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着和推进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选择的伟大、光荣、正确。

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陆全面确立,固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年之后的 1956 年。但事实上,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已经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丢掉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明确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奋斗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质上正是这个科学社会主义选择的第一步胜利;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的历史选择的出现,虽然就现实根源来说,确实是当时国际国内阶级关系根本变化的直接产物,但如追溯其历史原因,便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又都是 1840 年以来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路的艰辛历程发展到当时的必然归宿。

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早自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就逐步选择了资本主义,开创了学习西方、效法西方的历史进程。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后的七八十年间,是这种学习和效法在内容上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整个社会制度,在方法上从通过改良到进行革命这样的由表及里、步步深入的历史时期。但所有

这些学习,都没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道路,没能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遇。资本主义选择每深入一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失败、挫折也随之深入一步。先进的人们由这一步步的失败中,继续认识中国和世界,感到资本主义选择不能拯救中国、发展中国,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转向学习俄国;从那里,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只是由于这个武器的运用,才开始发生有利于人民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是拿起这个武器,确立和实行社会主义选择的倡导者、宣传者、组织者。一部中国近代史,就这个层面而言,可以说,就是“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①的历史;就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关系的演进、所处时代环境的转换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选择,产生了社会主义选择,而后又经过长期斗争,终于使社会主义选择在由少数先进分子的意志最后变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的同时,又由主观蓝图转化成为客观现实,也即是转化为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化为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之中正凯歌行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难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这一过程中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中国人民在选择自身历史道路的途中划时代的根本转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就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理想制度而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介绍到了中国。但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在中国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实现以后,又如何建设、发展这样的社会主义,这些介绍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者们却并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当时历史提出的迫切课题来予以解决和回答。真正回答并作为历史赋予的伟大实践任务而一步步解决了这些问题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解决成果,首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后就是扎根于中华大地上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解决的途径,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具体实际的不断的正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它的胜利与失误、前进和后退、发展跟曲折,都直接取决于是否实行了这种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正确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一部中国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发展史、胜利史,实质上也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结合史,是在这种结合中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事实一再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学说、运动,还是作为社会制度,都跟马克思主义的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直接熔铸在一起,具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最终取代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才得以实现;社会主义运动从工人阶级自发地反对资本剥削压迫的群众行动转变为自觉地、有组织有纲领地根本埋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的阶级战斗,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得以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由在国际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率先出现的“一国实践”的“孤岛”,扩展为“多国实践”的连成一片的“大陆”,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这些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实行了创造性的结合,才得以成功。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依据不同历史条件对它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科学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的全部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更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内在联系,证明了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也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来说,都具有首要的、决定性的意义。

领会这一点,最生动、最具体、最切近的途径,当然还是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

1840年以来所发生的整个近代的中国革命,一开始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历史指向。它不仅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还曾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道路。只是在经过自己的前赴后继、奋斗牺牲和历史的多次检验、反复比较,证明了这条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之后,中国人民才终于在革命目标的选择上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最后转到了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才终于在领导力量的选择上由以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最后转到了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固然是整个近现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划时代的根本转折,但同时,它也更更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长期推移过程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和继续。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客观固有的内在联系,首先就要明了这种联系得以产生的历史根源;也就是说,要由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历史进程中,由决定这种选择的不得以任何个人、集团和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客观规律中,深入揭示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对于这个必然性,对于中国人民认识、把握这个必然性并依之而做出自身历史选择的求索过程,正确地进行分析,科学地予以把握,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确认识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资本主义选择和社会主义选择之间的客观历史联系。

资本主义选择和社会主义选择,都出自于人民的觉醒。作为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争取独立、富强和人民摆脱贫困、奴役这两个基本主题的历史过程中,先后产生的两种方案、两条道路,它们的出现,都不是源于当时人们的主观好恶,而是源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选择的出现,固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选择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反映了决定人们主观选择的两种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嬗替而并不意味着也同时否定了此前人民为实现资本主义选择所进行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事实上,就当时的客观实际来讲,人民的历史选择发生由资本主义转到社会主义这种根本性变化,也只是由于国际国内客观条件、客观环境的改变而导致的解决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根本方案、根本道路的改变。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近代中国所要解决的历史主题本身。因而,社会主义选择与资本主义选择这两种对立的方案和道路之间,仅仅由于其所要致力解决的是基于同一国情的同一个历史主题,就必然会有许多相通的东西,产生和存在极为深刻的历史性的相承关系。对这一点,我们党不仅从来就没有加以回避和否认,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做过十分明确的郑重宣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毛泽东就曾十分明确地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

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虽然他在这同一段文字中又进一步指出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但是,毛泽东却并没有因此而把共产党出现以后为实现社会主义选择所进行的斗争同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所进行的以实现资本主义选择为目标的历次斗争截然割裂开来。相反,他倒是斩钉截铁般地明确论定,所有这一切斗争,“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①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论断,还只是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主题以及资本主义选择与社会主义选择这相互嬗替的两种选择之间由于其所要解决的历史主题的根本一致,而必然具有的客观的相承关系,那么,他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就二者关系所作的下列论述,则进一步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历次革命斗争的主体意志的历史联系上,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前后嬗替的历史选择之间,基于所要解决的共同历史主题,而历史地形成的极为深刻的主观的相承关系。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中指出,“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

^①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8~559页。